

从梵文语法看敦煌文献 同素逆序词形成的原因

敏春芳 杜冰心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同素逆序”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导致其出现有多种原因。对于敦煌文献中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文章采用“梵汉对勘”的研究方法,对来源语——梵语中并列复合词的构成方式进行溯本求源,探讨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产生的原因,揭示汉文佛典对汉语词汇构成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同素逆序词 敦煌变文 敦煌愿文 并列复合词 梵汉对勘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9) 04-0111-07

同素逆序词,指的是双音节复合词中构词语素相同且语素语序相反的一组词。同素异序词作为复音词中的一种特殊结构,在复音词大量产生的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中出现的尤其多,敦煌文献中同素异序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形式多样。

一、敦煌文献同素逆序词特点

敦煌变文中同素逆序词丰富多彩,结构类型变化多样。陈明娥(2003)统计变文同素逆序词共194对;^①韩茜(2009)考查的结果是257对。^②我们经过重新统计后,共发现同素逆序词254对。其中既有结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AB/BA式,如“悲伤/伤悲”“皆尽/尽皆”;也有词义、语法功能不同的AB/BA式,如“患疾/疾患”,还有与现代汉语词序相反的BA式,如“疗治”“勘校”“缠盘”等。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有

收稿日期: 2019-1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与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语言研究”(17ZDA311);兰州大学中央高校重点项目(17LZUJBWZD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8skzy023、2019jbkyzx007、2019jbkyzx016)

作者简介: 敏春芳(1969-),女,甘肃甘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与敦煌文献语言研究。杜冰心(1986-),女,山西太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史与西北语言接触研究。

^① 陈明娥《20世纪的敦煌变文语言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39-146页。

^② 韩茜《敦煌变文同素异序词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页。

的 AB/BA 两式都不再使用,有的其中一式被选中,另一式淘汰。在同素逆序词的取舍上,有的取决于两个单音词的语义特点,如,“父”在前,“子”在后,遂固定为“父子”,“国”在前,“家”在后,遂固定为“国家”;有的取决于两个单音词是专指还是通指,如,“山丘”,“山”通指,故在前,“丘”,专指,故在后。

声调的平仄在并列结构中发挥很大作用。汉语普通话声调多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的次序,如“宗教(阴平+去声)”符合调序,而“教宗(去声+阴平)”不符合调序。因此,将不符合调序的 BA 式“教宗”,调整为符合调序的 AB 式“宗教”,调序优化的并列式双音词优先进入汉语通用词汇。

万献初(2004)对陈垣(1959)用元代刻本《元典章》与清代沈家本刻本进行对校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清人把很多元人用的并列式进行了字序倒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调序问题,元人使用“去声+阴平”的词,清人改为“阴平+去声”,如,寸分/分寸、秽污/污秽、去失/失去;清人改元人“去声+阳平”为“阳平+去声”的词,如,孝节/节孝、位牌/牌位、背违/违背等。^①由此可见,在选择同素逆序词去留的过程中,两个音节的调序起决定作用,符合汉语调序规律的一式就会留存,不合汉语调序规律的则被淘汰。

二、从梵文语法分析同素逆序词形成的原因

同素逆序是汉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导致其出现有多种原因。如汉语词汇自身的发展规律,即构词之初语素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由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语素组合而成的并列式双音词,语素的次序比较灵活,容易发生逆序现象;为了适应文体和满足平仄押韵等的需要;还有方言的影响等等。

除以上传统说法外,敦煌文献中的同素逆序词,我们认为还可能与佛经本身有关。^②由于翻译梵文和描写佛教哲学的新思想、新观念,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因此,佛经语言不仅要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还要创造许多新词新义,满足翻译的需要。董琨(2002)明确指出汉译佛经语言有三种成分,^③其中第三种是汉语从未接触使用过的语言,译者将“印度的摩揭陀语、梵语以及古代中亚、西域诸语言”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外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事物进入中土,需要一大批相应的汉语双音词来表达。一个外来的新词语,被翻译成目标语时,其意义和用法会受到各种干扰,这种干扰

① 万献初《现代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优化构成》,《汉语学习》2004年第1期,第39-45页。

② 敦煌变文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篇目是讲解佛经或佛教故事,敦煌愿文95%以上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两者均与佛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③ 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第559-566页。汉译佛经语言有三种成分,一是形成于先秦的中原雅言的书面语即文言;二是汉魏以来初露端倪的体现当时口语的早期白话;三是从印度摩揭陀语、梵语直至古代中亚、西域诸语言中渗入的外来语言成分。

可能来自翻译策略，也可能来自译者翻译风格和语用习惯，还可能来自汉译佛典语法规则本身。

梵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系。梵语是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一种语言，属于屈折语，屈折变化纷繁复杂，如名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复数）和八个格；动词有时、体、式范畴等。汉语是孤立语，没有复数、词性、词格和时态等曲折变化，语法表达手段主要靠虚词和词序。这种类型上的巨大差异在翻译文献里也可以发现种种蛛丝马迹。朱庆之、朱冠明等的研究表明，佛经翻译带来的梵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有十余项，如人称代词复数、呼格、“N1+N2+是”判断句等。^①因此，对于敦煌文献中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我们可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进行“梵汉对勘”，穷源溯流。

梵文中有大量复合词。释惠敏（2011）将梵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归纳为“六离合释”（或称六合释）：相违释（并列复合语）、依主释（限定复合语）、持业释（同格限定复合语）、带数释（数词限定复合语）、邻近释（不变化复合语）、有财释（所有复合语），即六种梵文复合词的解释法。^②其中的“相违释”，印度梵文学家称此类复合词为“dvandva”（pair or couple 成双成对之意）。汉传佛教称为“相违释”，如《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总料简章》：“相违释者，名既有二义，所目自体各殊，两体互乖，而总立称，体各别故，是相违义。”指的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反（自体各殊，两体互乖）的词连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并列复合结构，也就是由意义相反的词根语素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梵语中这种联合式复合词的构成方式主要以音节为主，结构规则如下：

以元音 i 或 u 结尾字置前；以元音开头且以元音 a 结尾字置前。例如：

汉梵同序例：

汉语：手足	梵语：手足→pāi-pāda（手与足） ^③
汉语：水火	梵语：水火→udaka-gni（水与火）
汉语：内外	梵语：内外→adhyātma-bahirdhā（内与外）

汉梵逆序例：

汉语：戏乐	梵语：乐戏→rati-krīū（乐与戏）
汉语：诵读	梵语：读诵→pari-ava-√āp（读与诵）
汉语：禁戒	梵语：戒禁→īla-vrata（戒与禁）

音节少者置前。例如：

① 朱庆之《汉译佛典语文中的原典影响初探》，《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第379-385页。朱庆之，朱冠明《佛典与汉语语法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二》，《汉语史研究集刊》2006年第9辑，第414-459页。朱冠明《中古佛典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兼谈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语法的模式》，《中国语文》2011年第2期，第169-178页。

② 释惠敏《汉译佛典语法之“相违释”复合词考察——以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为主》，《法鼓佛学学报》2011年第8期，第2-3页。

③ 本文的梵—汉对勘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姜南副研究员的帮助，再次向她表示感谢！

汉梵同序例:

汉语: 日夜	梵语: 日夜→diva-rātrim (日与夜)
汉语: 持诵	梵语: 持诵→japa-dātrī/japa-mantra (持与诵)
汉语: 业道	梵语: 业道→karma-patha/karma-vartman (业与道)

汉梵逆序例:

汉语: 女男	梵语: 女男→strī-purusa (女与男)
汉语: 肥瘦	梵语: 瘦肥→ka-sthūlatā (瘦与肥)
汉语: 敬爱	梵语: 爱敬→prema-gaurava (爱与敬)
汉语: 往来	梵语: 往来→gamana-pratyāgamana (往与来)
汉语: 鸟兽	梵语: 鸟兽→mr̥ga-vihanga (兽与鸟)
汉语: 上下	梵语: 下上→mdv-adhmātra (下与上)
汉语: 疗治	梵语: 疗治→pra-yoga/pra-sama (疗与治)
汉语: 乐苦	梵语: 乐苦→sukha-duḥkha (乐与苦)

梵语两个亲属名称形成并列复合语时, 前字末以 ā 形式 (主格单数) 连结后字。

例如:

汉语: 父母	梵语: 母父→mātā-pitarau (母亲与父亲)
汉语: 父子	梵语: 父子→pitā-putrau (儿子与父亲)
汉语: 妻子	梵语: 子妻→putrā-dāra (子与妻)

梵语两个亲属名称组成的并列复合词中, 既有汉语同序的“父子”, 也有和汉语逆序的“母父”和“子妻”。

梵语与汉语并列结构语序规律各有特点。汉语是单音节语言, 节奏明朗, 音节容易对应; 梵语是多音节语言, 元音分单元音、二合元音、三合原因。语音特点使梵语并列结构的词序有其自身规律, 长度规律在梵语并列复合式的语序中占强势。比如音节少者置前, 如上所举, “女男”“瘦肥”“兽鸟”“下上”“爱敬”“疗治”“乐苦”等, 梵语与汉语之间的音节排序差异会造成同素逆序词的产生。

另一方面, 词序与形态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形态变化越多的语言, 其词序越灵活; 无形态变化的语言, 词序相对比较固定。汉语是典型的分析型语言, 词序相对固定, 词序改变, 意义也往往随之而变; 而梵语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 通过形态标记表达各种语法意义, 词序比较灵活。通过词的形态就可以辨别梵语的词类, 在句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词的关系等, 即使词的位置发生变化, 也仍旧可以表达原来的意思, 所以语序比较灵活。曾昭聪 (2005) 选择了“顿止/止顿”“垢秽/秽垢”“欺侵/侵欺”“学计/计学”四组同素逆序词, 检索了大正藏全文和相同时代的两部佛经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 每组同素逆序词的使用频率大相径庭, 截然不同。^① 我们仅摘录《大正藏》的使用情况, 见

^① 曾昭聪《中古佛经中的字序对换双音词举例》,《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第84-87页。

下表(表1):

表1 《大正藏》同素逆序词使用频率统计

译经名	垢秽	秽垢	侵欺	欺侵	顿止	止顿	学计	计学
大正藏	841	51	98	13	167	50	9	5

此表一目了然:“垢秽/秽垢”“欺侵/侵欺”“顿止/止顿”“学计/计学”四组同素逆序词在使用频率上相差较大,可以看出在梵语翻译成汉语时,不同的语法习惯会导致不同的语法结果。当新语法格式产生初期,人们面对功能相同、相近,但结构顺序相反的新、旧两种语法格式时,无所适从,就可能出现同序、逆序或两者皆可的弹性现象。当引进格式与原有格式相近时,符合汉语语序的一式会在接受语——汉语中保存下来继续使用,另一式则可能被淘汰。选择的原则往往是本土的战胜外来的,旧的战胜新的;但有时在不同方言中,发展方向、最终结果有所不同。

梵、汉之间如此,英、汉之间亦如此。Cooper 和 Ross (1975)总结了七条英语并列结构排序的语音规律。^①一般并列结构中,音节少的词放在多的之前。下面我们仅举数例汉语和英语序相反的并列词组。例如:

艺文: art and literature 寡鰥: widow and widower
 食饮: eat and drink 欢悲: joy and sorrow

英语并列结构的语序亦遵循长度规律,音节少的通常会放在音节多的之前。这个规律既是平衡语言节奏的需要,也符合了人类对信息处理由简到繁的顺序:较短成分出现在较长成分之前的语序原则,即“贝哈格海尔”(Behaghel)定律之一。在具有同等地位的单位并列时,最长的成分出现在序列最后。此外,英语还遵循元音前高后低规律,即并列项的语序按元音舌位的高低,做先高后低排列。例如:

火水: fire and water 坏好: bed and board
 后前: back and forth 旧新: old and new
 热冷: hot and cold 铁钢: iron and steel
 大小: small and large 酸甜: sweet and sour

以上几组词遵循了英语元音舌位先高后低排列的规则。如果直译为汉语就形成逆序词。

汉藏语系语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戴庆厦(1990)在考察景颇语和彝语并列复合词语素顺序时指出,并列复合词的顺序与语义特点关系不大,主要由语音特点决定,与元音舌位的高低和前后搭配有关,舌位高的元音在前,舌位低的元音在后。据此得出的结论:“并列复合词不同的词素孰先孰后,存在什么制约条件,不同语言的特点各异。”

^① Cooper W E, Ross J R. Word order, Grossman R E.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Functionalism*.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5, pp. 63-111.

有的是语音条件，有的是语义条件，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但不外乎都是语音、语义两个方面。”^①

如上所举，如果并列复合词的排序规则决定于语音条件，那么，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会遵循原文风格直译，尤其是汉译佛典，语言风格主张“信”“质”，偏重于直译，语句不得随意增减，语序也力求照搬直译，就会导致一批同素逆序词的产生，如，女男（strī-purua）、母父（mātā-pitarau）、爱敬（prema-gaurava）、瘦肥（ka-sthūlatā）、外内（bāhyadhyātma）等词，皆是如此。

三、语言接触影响下同素逆序词形成的机制

根据 Thomason 的观点，影响语言接触程度的因素有：标记性成分状况、不同语法特征的等级状况、源头语和接受语语序类型的相似状况。^② 其中，不同语法特征的等级状况指的是由词汇、句法、派生形态以及曲折形态构成的等级链，即“非基本词汇→句法→派生形态→曲折形态”。排在最左边的成分是“非基本词汇”，结构疏松，结合不够紧密，位置也不稳定，还没有凝固在一起；位置越靠右的句法、派生形态和曲折形态，其结构越来越紧密，结构化程度也越高。跨语言的接触中，即便在语言接触程度不深的情况下，非基本词汇是最容易被借用和复制的，汉译佛典即是如此。

汉译佛典将来源语——梵语翻译成接受语的最初阶段，一般是直译，即采用来源语的结构模式，梵语中的新名词、新概念比较轻易地复制和移植到汉译佛典中。从东晋开始，译师们提倡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翻译，同素、逆序词不断涌现。既有符合梵语语法结构的兽鸟、下上、乐苦等逆序词，也有符合汉语和梵语的饮食/食饮、虚空/空虚、神通/通神、/皆尽/尽皆、常时/时常等词。另外，汉译佛典中因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法变化，既涉及语法特征的产生，也涉及语法特征的消失。汉梵语言相互接触过程中，源头语——梵文存在比较典型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模式，必然会导致接受语——汉语中一些特征的产生、语法功能或语法模式的增加。如敦煌愿文和变文中有“男女”和“女男”两种逆序词的用法。例如：

S. 3914 《结坛发愿文》记载：

贤者以（与）优婆夷、清信女男表□□□：□（唯）愿心恒佛日，福竭嵩山，意切宗乘，财盈满堂。^③

S. 4624 《发愿文范本等》记载：

① 戴庆厦《景颇语并列结构复合词的元音和谐》，《民族语文》1986年第5期，第23-29页。戴庆厦，李泽然《哈尼语的并列复合名词》，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编《中国哈尼学》第1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36-252页。

② Thomason, Sarah G.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595页。

营逆修十供清斋，今则某七为道。生不作福，没后难知未尽。少无男女，老复孤遗，莫保百年。^①

P. 3270、Дх. 1049《儿郎伟》记载：

兄供（恭）弟顺，姑嫂相爱相连（怜）。男女敬重，世代父子团缘（圆）。家长持钥开锁，火急出帛缠盘。^②

以上三例是敦煌愿文的用例，“男女”一词习见，但也有逆序词“女男”的用法。再看敦煌变文的用例：

经道男女有病，父母亦病；子若病除，父母方差。人家男女，父母憍怜，……男女稍若病差，父母顿解愁心。人家父母恩偏煞，于女男边倍怜爱；忽然男女病缠身，父母忧煎心欲碎；女男得病阿娘忧，未教终须血泪流。……直待女男安健了，阿娘方始不忧愁。才见女男身病患，早忧性命掩泉台。^③

在这段“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一）”中，“男女”和“女男”前后变换使用。我们前面分析了梵文中“strī-purusa（女男）”一词的来源，属于音节少者前置例，译师将其直译为“女男”；汉语由于两个单音词的语义特征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男”在前，“女”在后。不同类型的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可见一斑。当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互相接触影响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表达同一种语义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既有的结构模式，这些都在翻译的文献中流露出从原文中带来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在汉语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产生一定影响，在汉语中留下了“底层”。

因此，在敦煌愿文和变文与佛经有关的文献中，同时出现“男女/女男”两种用法就不足为怪了。但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一种形式，而不可能是两种形式长期并存使用。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并存共用形式，基本上都在接触条件消失以后，归并为一种格式。语言接触中的归一，汉语语法史上，基本都是本土的战胜外来的，汉语固有的格式在发生语言接触的社会历史条件消失之后，淘汰掉新的格式，重新成为主要或唯一的形式。

综上所述，由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和汉译佛经的影响，即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敦煌变文和愿文中同素逆序词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对于与佛经有关的同素逆序词，我们应采用“梵汉对勘”的研究方法，从来源语——梵语出发，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溯本求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结构以及不同类型的语言给汉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揭示汉文佛典对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① 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第124页。

② 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第951页。

③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977页。